本版编辑：　龚克　E-mail:gongke@ccps.gov.cn　Tel:010—62806124　　2015年6月1日

新时期论坛

从哲学角度看“三严三实”

□夏卫东

“三严三实”蕴含着深刻的哲理，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看“三严三实”的重大意义，具体体现在“三个结合”“三个契合”“三个融合”上。

用全面的观点看，“三严三实”体现了“三个结合”。主观和客观的结合。“三严”针对主观世界改造，要求党员干部坚持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三实”针对客观世界改造，要求党员干部把握科学的方法论。内因和外因的结合。“三严”是内在要求，包含政治追求、组织原则、纪律要求；“三实”是行为约束，包含思想路线、工作方法、处世态度。做人和干事的结合。“三严”反映了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要求坚持“严”字当头，坚定理想信念；“三实”反映了党员干部做事的行为准则，要求坚持“实”字筑底，创造经得起实践检验的业绩。

用联系的观点看，“三严三实”体现了“三个契合”。契合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精华。我国古代进步知识分子一直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当作人生目标，“三严三实”以朴实无华的语言，契合了这一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契合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要求领导干部必须坚持用权为民，按规则、按制度行使权力。契合了作风建设的现实要求，即持之以恒改进作风，不断以作风建设的新成效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供坚强保障。

用发展的观点看，“三严三实”体现了“三个融合”。融合了从严治党的宝贵经验。从井冈山革命时期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整风，解放战争时期的“两个务必”，一直到新时期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党90多年的历史，就是一部从严治党的历史，“三严三实”是对从严治党宝贵经验的继承和发扬。融合了作风建设的根本要义。“三严三实”要求，从价值追求、政治品格、做人准则方面进行作风建设，融合了新时期作风建设的根本要义。融合了做官为政的基本准绳。做官先做人，为政先立德。“三严三实”要求，明确了做官为政的底线，为党员干部加强党性锻炼开出了一剂“提神醒脑”的良方。

“三严三实”既强调价值观的导向和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又强调实践的重要作用，体现了认识与实践的统一。领导干部务必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从严从实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真正把“三严三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严以修身，常怀“谨慎之心”。自划“警戒线”，做到“慎初”，始终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信念，走好第一步，把好第一关；自设“防火墙”，做到“慎独”，做到八小时内外一个样、人前人后一个样、有没有监督一个样；自套“紧箍咒”，做到“慎微”，正确看待小与大的辩证关系，从小事小节中涵养大境界。

严以用权，常怀“公仆之心”。掌权不迷失，用之为民，把执政为民的理念牢记心中，不断提高群众获得感；用权不逾矩，行之有规，牢固树立法治思维，在法治框架内办事；有权尽好职，履之有责，做到在其位，谋其政，有其职，履好责。

严以律己，常怀“敬畏之心”。坚守法律红线，在法治之下而不是法治之外更不是法治之上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坚守纪律底线，无条件遵守党的各项纪律和规矩，特别是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守道德防线，珍重自己的人格和声誉，守好内心的一片净土。

谋事要实，常怀“求是之心”。谋事要实，首在心实，端正心态，树立正确的事业观、政绩观和全局观。谋事要实，贵在情实，摸透实情，提升谋事的质量。谋事要实，重在落实，脚踏实地，做到决策符合实际情况、符合客观规律、符合科学精神。

创业要实，常怀“担当之心”。敢于担当，面对矛盾敢于迎难而上，面对危机敢于挺身而出，面对失误敢于承担责任。善于担当，加强学习修养，注重实践锻炼，增强担当的本领。勤于担当，坚持“实”字当头、“干”字为先，在实干中解决问题，在实干中创造业绩。

做人要实，常怀“赤诚之心”。做一个忠诚的人，绝对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事业，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做一个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一个公道正派人，坚持按规矩、政策、程序办事。

符合“三严三实”的老实人

□邱炜煌

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是我们党一贯倡导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三严三实”体现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价值追求、宝贵品质和人生态度，是对当代“老实人”标准的深刻阐述和生动诠释，我们要把它作为修身处世为政的基本遵循。“三严三实”视域中的老实人，体现优良传统与时代精神的有机统一，是忠诚者、实干者、担当者、清廉者，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墨守成规、胆小怕事、谨小慎微者，更不是老好人、两面人、骑墙派。

做老实人既要克服乱作为又要反对不作为。老实人谋事创业要实，坚持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规律，符合人民利益，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坚决制止各种弄虚作假、违法乱纪的乱作为，不搞急功近利，短期行为；不擅权谋私利，搞权权交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利益输送。同时，又要防止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旗帜鲜明地反对为官不为。面对经济新常态、简政放权、依法行政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正视困难，直面矛盾，主动适应，迎接挑战。应当明确懒政庸政怠政也是腐败，不容许出现“门好进了、脸好看了、可事难办了”“不吃、不拿、也不干”现象。

做老实人既要循规蹈矩又要改革创新。讲纪律守规矩，有令则行，有禁则止，这是老实人的基本要求。党员干部必须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忠诚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到在党言党、在党忧党、在党为党。严格遵守党章、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和廉洁自律规定等，坚决执行组织决定，自觉遵守组织程序，主动服从组织安排，不做口是心非、阳奉阴违的两面人。如果说循规蹈矩是老实人的底线要求，那开拓进取则是老实人的时代特征。对待改革的态度，是衡量老实与否的重要尺度。我们要当改革的促进派，正确把握改革大局，想改革，谋改革，善改革。

做老实人既要严于律己又要敢于斗争。老实人要严以修身，坚定理想信念，追求高尚情操，坚持用权为民，克服特权现象，坚守廉政底线，自觉遵纪守法，但不能满足于独善其身，面对错误思想和歪风邪气要坚持原则、敢于斗争。老实人绝不是老好人，良好政治生态需要越来越多的“眼睛里容不得沙子”的人。要坚决反对多栽花少栽刺的好人主义，不能是非面前不开口，遇到矛盾绕着走，更不能对错误倾向和不正之风，不制止，不争辩，不斗争，明哲保身，躲闪回避，无原则迁就，无底线退让。

做老实人既要埋头苦干又要目光远大。埋头苦干、默默奉献是老实人的鲜明底色。做老实人要谦虚谨慎，一步一个脚印，不好高骛远；爱岗敬业，干一行爱一行，在平凡岗位做出不平凡业绩；乐于奉献，把自己交给组织，把青春献给事业。老实人的本质在于说老实话办老实事，迂腐、懦弱、保守、沉默是老实人的过时标签，既埋头苦干又目光远大才是当代老实人的完美品质。这个意义上的老实人，应该具有广泛学习的大视野，运用战略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法治思维思考问题、谋划工作；应该具有海纳百川的大胸襟，既讲原则又讲风格，既讲党性又讲情义，与人为善，待人以诚，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应该具有敢为人先的大境界，不但肯干实干，而且会干善干。

做老实人既要慎用权力又要敢于担当。老实人应该把慎权与担当完美统一，慎权是基础、本色，担当是追求、境界，慎权支撑担当行为，担当体现慎权价值。慎权要落实几点：权为民所赋，权力来自人民，党员干部是人民公仆，必须为群众掌好权用好权；权由法所定，落实权力清单和负面清单，把权力关进法制“笼子”；有权必有责，实行责任清单，使权责相对应，不迁就放任失职渎职行为；用权不任性，优化内部约束，强化体外监督，严厉惩治以权谋私、利益输送。敢于担当是领导干部具有蓬勃朝气、昂扬锐气、浩然正气的重要标志。党员干部要坚持原则，求真务实，开拓进取，迎难而上，事出公心，宁可损失自己的“羽毛”，也不当太平官。时下有的干部采取极端的方式对待政商关系，从过去的“勾肩搭背”变成了“背对着背”，视商人、企业家为洪水猛兽，避而不见或者“软拒绝”，这说到底还是缺乏担当精神，应当禁绝。

治理“为官不为”的措施

□陈书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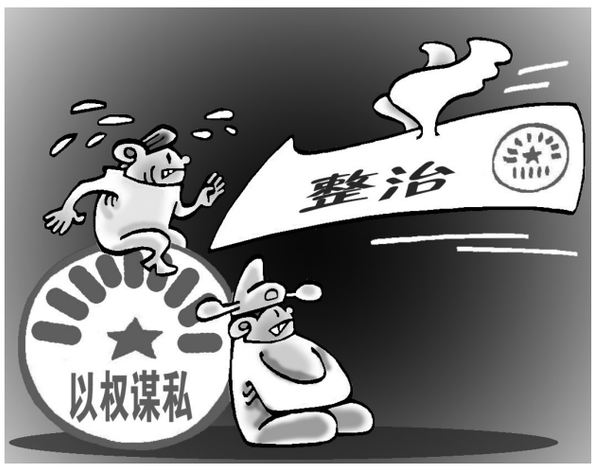
“为官不为”是指公职人员没有完全履行好职责的行为。这样的行为降低行政效能，损害党和政府形象，必须引起足够重视，采取多样化的激励机制和监管手段加以解决。

强化绩效考核。绩效考核是当今世界较为通行的管理手段之一。具体的做法是：年初确定重要工作目标；年中定期不定期地进行明察暗访，对违纪违规或偏离目标的现象采取批评、通报、责令整改等纠偏手段，确保每个岗位的人员都能保持起码的工作效率；年终以绩效考核分数作为等级评定、评先评优的重要依据。使用系统的绩效管理制度可以让国家公职人员行有目标，行有底线，国家机关的效率也能因此得到最低限度的保障。这是最常用、最管用的治理“为官不为”办法之一。但是，绩效管理灵活性较差，大多只能满足对既定目标的考核，对新增工作和计划外任务，很难及时纳入绩效考核评价体系，影响到被管理者的创新积极性。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完善绩效管理方法，提高绩效管理效果。

严密制度约束。近年来，针对不作为、乱作为等现象，施行了离任审计、述职述廉、巡视巡查等制度，目的就是编织更严密的制度之笼，堵塞以权谋私的口子。在这些限制性制度之外，我们还有必要出台一些救济性制度，让公职人员清楚地知道自己万一不慎“好心办错了事”，能获得多大程度的宽容和保护。如，有些地方正在探索制订责任豁免等制度，在一定范围内允许试错、宽容失误，为真正干事创业者保驾护航。

完善激励机制。在大多数管理理论中，激励都被看作是管理的主要功能。工资福利是激励的重要手段但不是唯一手段，在工资福利增量较小、变动困难的情况下，可以灵活应用、综合应用多种激励手段，使激励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当前，可以运用的激励手段比较多，如调升工资、发放津补贴和奖金等经济性激励，晋升、轮岗、进修、表彰奖励等机会性激励，还包括生日短信、口头表扬等情感类激励。善用激励，就要将激励与个人贡献挂钩，结合个人特点因需激励，及时激励。

培育职业道德。激励的最终目的是提升被管理者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但达到这个目的的通道却不是物质利益，而是被管理者自身对于这种激励的接纳与认同。戴尔·卡耐基说：任何人都不可能真正被他人激励起来，这扇门是从里面反锁上的，他们应当在能够培植自我激励，自我评价和自信的气氛中工作。营造出能够培植自我激励、自我评价和自信的氛围，提升公职人员的职业道德水准，“为官不为”现象才能不治而愈，这也是“为官不为”得到善治的最终表现。



吴之如/画

理论研究

求同识异法视角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邱耕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含着两个基本的命题：其一，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实践必须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这是我们的事业取得胜利的思想保障和基本条件之一。其二，马克思主义要不断“中国化”，即要做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践的相结合工作，在这种结合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或形成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发展。我们不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而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出自己的方针，所以才能取得胜利。”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为什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要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求同识异法无疑会给我们提供一个明晰而富有学理意义的答案。

求同识异法是对事物的共性和个性辩证关系原理的概括反映。众所周知，共性和个性是一切事物固有的本性，或者说，每一事物既有共性又有个性。所谓共性是一切事物所共有的性质；所谓个性是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性质。共性体现并决定着事物的普遍性质、基本性质；个性则体现或揭示了事物之间的差异性。共性和个性的辩证关系表现为：共性寓于个性之中并大致包括着个性，没有个性就没有共性，共性要以事物的个性为前提和基础；个性体现着共性并受共性的制约，没有共性则个性就只能是具有离散力和破坏力的孤立的、“死寂”的“点”，从而无法获得正常生存和发展的外在系统条件；共性和个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共性和个性辩证关系原理所具有的方法论意义，就在于求同识异法的形成。换言之，当人们根据共性和个性辩证关系原理去认识事物时，就形成了求同识异法。

求同识异法无疑是一种十分重要的认识方法。它要求人们在认识事物时，既要把握事物的共性，又要认识事物的差异性。具体而言，求同识异法的根本功能，就在于要求人们在相同的事物中要看到其不同之处，在不同的事物中要看到其相同之处。由于每一事物既有共性又有个性，所以我们在认识事物时，必须以求同识异法为基本的认识工具。

根据求同识异法，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具有科学社会主义所要求的共性，这些共性包括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形式，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等等。可见，既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是所有具有科学社会主义性质国家的根本特性之一，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必须坚定地以马克思主义为自己事业的根本指导思想，如果背离了这一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会变色。另一方面，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还具有差异性或个性，而这种差异性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必须要因时因地而变，即要做到时代化、民族化。那么，如何理解不同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差异性呢？这还需要从实践的现实性谈起。

“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实践的时空属性表明，作为人的社会物质活动，实践的发生和发展，必然要经历一定的时间，占有一定的空间，以时间和空间为自己的存在形式。时间的形式赋予了社会实践以变动性或在发展阶段上的差异性的特点；空间的形式则显示着社会实践的地域性或在空间上的差异性的特点。进一步而言，实践的空间形式意味着，现实的实践总是处在特定的空间范围之中的，即实践总是表现为一定的地域性或国别性的实践。这样，马克思主义要指导实践特别是指导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时，无疑是要指导存在于一定地域或国家之中的具体的社会主义实践。但不同地域或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又各不相同，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产生于十九世纪的欧洲，而当把它运用于指导世界不同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自然需要有一个适应或结合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的民族化、国家化的过程。因此，根据实践所具有的特定空间性的特点，马克思主义应当而且必须中国化，即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观点同中国的具体实际、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并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等不同历史时期的实际问题，使起源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变为扎根于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正是由于看到了这种实践的空间差异性问题或社会主义国家间在革命和建设等方面所存在的种种不同，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张。1938年，他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这里所谓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国的特性、中国的特点，实际上是指中国革命与其他国家革命实践的差异性问题。就是说，中国的革命实践有中国的特点，因而当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实践时，自然需要中国化。



在求同识异法的视域中，我们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要防止出现两种错误：其一，只讲共性而忽视了个性或差异性，从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进而僵化，这是一种窒息马克思主义的做法；其二，只讲个性或差异性而忽视了共性，从而在实践中出现背叛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的做法。而无论哪种做法，都是错误的，不可接受的。

求同识异法使我们看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性，同样，根据求同识异法的方法论原理，我们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必须要做两方面的工作：其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工作。所谓中国化，是指要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诞生出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突出的是社会主义实践的个性或差异性。其二，用马克思主义“化中国”的工作。所谓“化中国”，是指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观点、方法等来指导中国的发展，使中国社会的现实发生积极可喜的变化，使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化中国”突出的是社会主义实践的共性或相同性。当然，“中国化”和“化中国”是有机统一、密不可分的。正是在这种统一中，我们既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也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从而为我们事业的成功和中国梦的实现提供着制度和理论方面的根本保障。